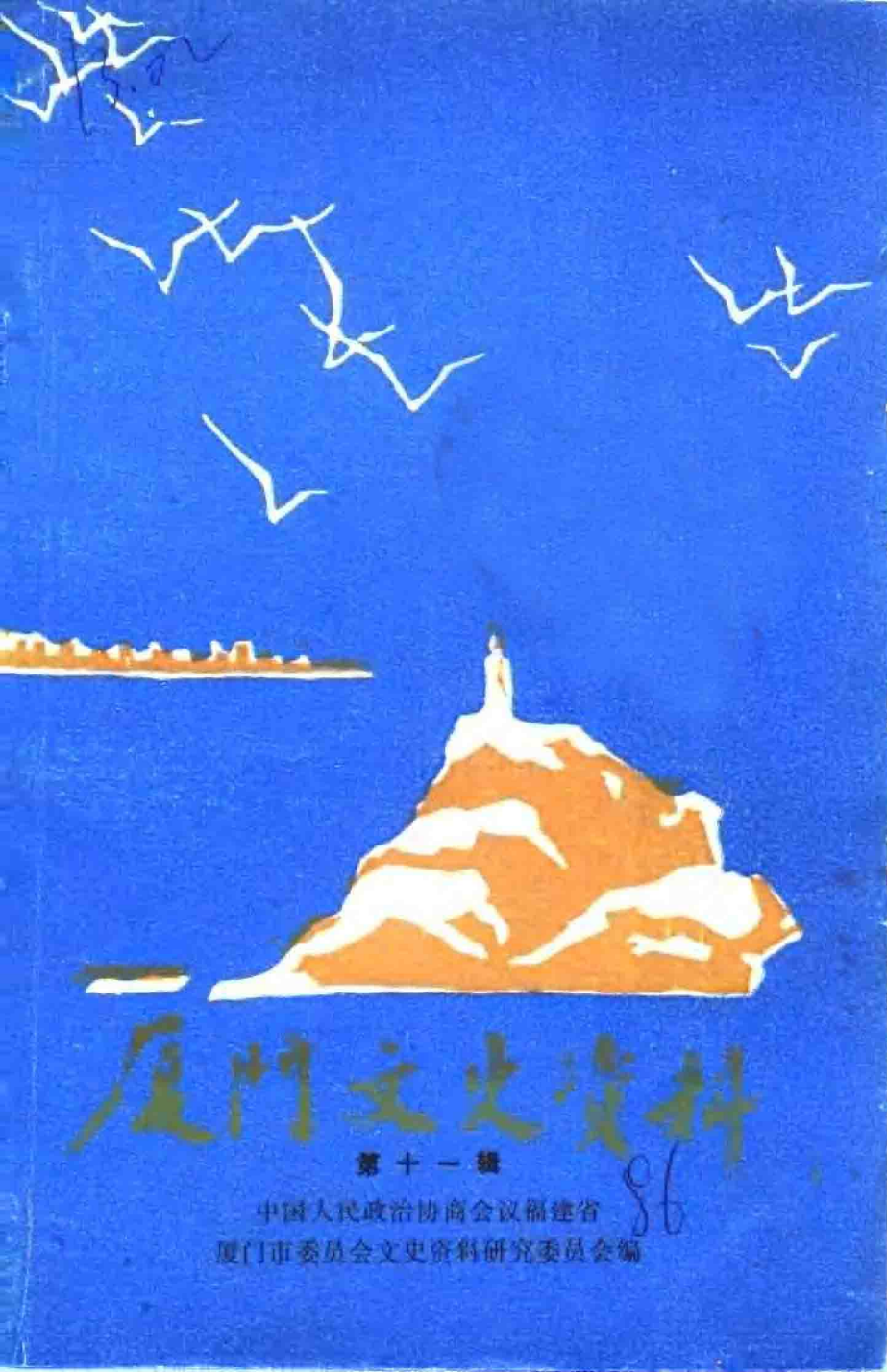




廈門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5102/1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封面题字：高 怀

封面设计：陈水应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厦门市郊区印刷厂承印



第十一辑 目 录

- 陈嘉庚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一次讲话……陈水扬(1)
- 记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来厦……许国仁(4)
- 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概况及其作用……林金枝(8)
- 孙炳炎先生的艰苦创业历程……丁秋来(29)
- 爱国诗人——林肇云……林纯仁(36)
- 我所知道的黄世金……舜 民(41)
- 厦门市警察机构沿革……姚自强(48)
- 厦门市沦陷时期的伪警察机关……姚自强(55)
- 旧福建省水警总队厦门第二大队发展过程及其活动概
况……李度青(67)
- 偷渡菲岛的诈骗案……曾延丁(80)
- 解放前发生的几起大走私案……许国仁(84)
- 厦港鱼行与渔民……李 冰(89)
- 日伪时期全闽水产公司的经营方法和管理
手段……李 冰(100)
- 操纵厦门航业的六和船务公司……刘丕辉(104)
- 厦门安息日会的应变部署……张子权(109)
- 《益同人公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林纯仁(119)
- 厦门教育大事记(上)……吴玉液 谭南周(127)

陈嘉庚在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的一次讲话

陈 水 扬

在陈嘉庚先生八十三岁那一年，即1956年，他被推举为全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当时，他住在故乡厦门集美。十一月十一日，集美镇干部和集美各校师生数千人在福南堂隆重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他在讲话中，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两次会晤孙中山先生的情景。

陈嘉庚先生说，孙先生到新加坡时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陈嘉庚先生就此作了说明：自从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国内屡次闹革命，如郑成功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厦门小刀会革命等，在这些革命遇到挫折时，都曾有过革命者逃亡到新加坡去，再组织会党，以恢复革命。而华侨在南洋开土辟壤，经营实业，百年来备受帝国主义束缚，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不能保护华侨，甚至与殖民者勾结迫害支持革命的华侨，无不极为不满与愤慨，因此对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革命者尽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到新加坡时，即联合“福兴”等革命党人，发动华侨赞助革命，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因此孙先生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到新加坡是1900年，与林文庆

(1869——1957)有接触。当时林文庆还是个维新派青年，在孙先生的指引下，很快转变为孙先生的热情追随者和中国文化的积极推崇者，并在这一年成功地营救过孙中山与日本革命志士宫崎寅藏。林文庆，福建海澄人，是陈嘉庚先生的挚友，1921——1937年，林文庆长期担任陈嘉庚所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当时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对陈嘉庚先生自然有深切影响。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到新加坡是1906年4月6日，逗留数日便去日本，不久，第三次到了新加坡。6月30日在晚晴园（1904年起成为孙中山先生到新加坡时的住所，现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产业，辟为革命胜地，供人瞻仰），孙中山先生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自此成为革命派在南洋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在这次访问新加坡期间，曾与陈嘉庚先生会见。陈嘉庚深情回忆道：我跟孙先生会见时，在座十余人，热烈讨论制作青天白日旗，当有人捧一杯白开水给孙先生喝时，抽出自来水笔，注入一滴红墨水，白水立即变成红色，孙先生见了，高兴地说：“红是喜事！”一饮而尽。

1910年春，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双双剪去发辫，在晚晴园宣誓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全侨轰动。11月9日，福州易帜，福建革命政府宣布成立，致电海外华侨请求援助，陈嘉庚先生回忆道：11月13日，新加坡侨领即在“天福宫”开会，筹设福建保安会，举我为会长，当场募叻币二万元电汇福州，福州传为二十万元，人心大定。后于一个多月内，又募集二十多万元汇给福建革命政府。

12月16日，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回国途中抵达新加

坡，又与陈嘉庚先生会见。陈老先生回忆道，马坤跟孙先生一起来。孙先生生活节俭，反对穿礼服开大宴会。在欢迎会上，孙先生讲了话，请华侨捐款赞助革命，我赠一万元给他做路费。他说，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我许筹五万元。其后，他由上海电告：将赴南京需费，我即如数汇交。以后，孙先生不曾再去南洋，我回国也很少，就没再见面了。11月13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陈嘉庚先生又撰写《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即《回忆孙中山先生》）由中国新闻社发表。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当时八十三岁高龄的陈嘉庚先生连续三天，既在纪念大会上演说，又对来访的记者发表谈话，又撰写回忆文章。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之情是何等深厚啊！

记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来厦

许 国 仁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大军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宣告解放，继而乘胜追击，直捣上海，蒋家王朝已敲下丧钟。

当时厦门被称为东南的桥头堡，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纷纷逃厦，龟缩一隅，凭藉这天然屏障和坚固碉堡，企图作困兽斗。

频临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七到九月间，蒋介石两度来厦进行活动，引起全市人民极大骚动。

早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传闻蒋介石欲以鼓浪屿作为他的“行辕”之一。不久，果然派出原南京总统府侍从室侍卫长石祖德为厦门市警备司令，副侍卫长刘树梓少将来厦接任市警察局长，鼓浪屿警察分局局长一职即由浙江奉化县人蒋恒德担任。并选定鼓浪屿的“瞰青”别墅作为行辕，大兴土木，修饰一新。

蒋介石第一次来厦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一日，当天上午九时乘轮离穗，于翌日(廿二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专轮及护航舰徐徐进入厦港，十一时在鼓海面停泊。当时随行人员有：俞济时、

黄少谷、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等。在厦的军政长官，久已鹄候在码头上，当航舰一抛锚时，他们即乘海军汽艇，整装登轮晋谒。其中有：东南长官公署长官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敬久，廿二兵团副司令唐咏山，代理警备司令万成渠，前任警备司令石祖德，厦门市市长李怡星，海军学校校长郭发鳌，市海军巡防处处长康肇祥，宪兵团长莫中令，国民党漳厦党务督导专员黄谦若，市党部书记长王连元等十多人。

蒋介石身着天青色绸长衫，脚穿黑布鞋。在轮上与晋谒的各军政要员一一握手，表示称谢。蒋自从1949年元旦献词向共产党求和“下野”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他退居奉化，但时刻注视政局，仍在幕后操纵。此次系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外出巡视。自从长江江防，蒋军防线崩溃，残兵败将逃窜入闽，国军各部队已失去作战信心，退入闽南地区，苟延残喘。蒋介石仆仆风尘，从台湾、菲律宾、广州等地，经过半个多月的水陆跋涉，到了厦门。此行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替部下打气，亲自抚慰，表明自己仍是三军统帅。

蒋在轮上，无心和大家谈话，左顾右盼，强颜欢笑，眺望厦鼓风光，对阔别已卅载的东南沿海前哨的厦门，青山卵石，碧海狂涛，依恋不已。

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排挤，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后前往日本。蒋介石的粤军总司令亦干不下去，即辞职悠闲，曾来厦游览，初住鼓西仔路头海滨旅社，后又迁往乌埭角姓蒋的他的亲属私宅，前后住了六个月之久，第一次和厦门结了缘，他对厦门市风光、气候，留下良好印象。卅年后的今天，重临鹭岛，人事虽非，

而风物依然，无限感慨，对此，蒋介石犹频频提起。

当日下午，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自广州乘专机飞厦，立刻登轮晋见，奉侍父侧。原市警备司令李良荣，闻蒋来厦，亦于是日薄暮由榕赶厦晋谒蒋介石，晚上蒋偕李等到鼓行馆休息。

廿三日晨十时，菲律宾驻厦代领事罗曼那，偕菲总统秘书霍利葛里斯和驻穗使馆武官罗敏尼奥莱等五人，由市府外事秘书许其田陪同前往蒋行馆，向蒋介石致敬。蒋未接见，由黄少谷代表接待，对有关中菲问题交换意见。

中午十二时，蒋介石接见闽西南师长以上将领，并共进午餐。席间，蒋侈谈军事反攻事宜，当场作了一些指示。下午二时与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密室长谈。

下午四时至六时，罗曼那在菲领事馆举行鸡尾酒会，招待蒋和随行人员，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黄金涛，厦市长李怡星等也应邀参加，席间互祝蒋介石与李季诺身体健康。

当晚，蒋介石一行即离厦。

蒋介石第二次来厦

蒋介石第二次来厦，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当时福州、漳泉等地，皆先后解放。我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厦门蒋军凭藉着构筑众多混凝土防禦工事，企图作垂死挣扎，蒋军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逃厦时已溃不成军，蒋介石为激励前线官兵，经过二十小时惊涛骇浪的海上航行，于七日上午十时半，蒋氏乘着“座舰”，横渡台湾海峡，再次来厦，蒋经国跟随左右，偕蒋前来的还有东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林蔚，中委谷正纲、俞济时等，当坐舰到达时，

东南长官公署长官汤恩伯，中委方治、雷震，舰队司令黎玉玺、兵团司令李延年、刘汝明、军长曹福林、沈向奎和厦门警备司令毛森等乘砲艇登舰恭迎。当时厦门的外围，已被我人民解放军控制，解放厦门岛的战斗序幕即将揭开。蒋介石是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硬冒着头皮前来。他在轮上聆听汤恩伯的汇报后，即与汤等共进午餐。席间蒋对战斗在厦门前线的国民党官兵亲加慰问，备极嘉许；他对厦门设防的众多堡垒，认为是固若金汤，大肆吹嘘，但实际上蒋色厉内荏，此行目的是布置总退却。

下午四时，蒋在胡里山汤恩伯总部，召集驻军长官亲切训话，勉励大家戮力同心，为党国效劳，争取最后胜利。五时半，蒋接见福建省保安副司令范诵尧，财政厅长陈拱北，厦门市长李怡星，福建省高等法院院长李襄宇和中央社驻厦特派员冯文质等一些新闻记者、

蒋介石身穿草绿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憔悴，环顾左右，心事重重。他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与中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各地军事不断失利，噩耗频传，长江江防蒋军残部南逃，溃集福建，准备重建或整编，到处征集补充兵员。闽省地方人士，对国民党早失信心，省参议会公然反对征兵，因此蒋对福建十分重视，曾于七月十一日偕陈诚等一大群随众，分乘“美龄”号等专机七架飞榕，在义序机场接见福建军政首长面授机宜，谈话历经三个多小时，然后飞穗。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两次来厦，先后仅隔七十多天，这是在全国蒋政权将即完蛋时，他明知大势已去，第一次来厦，前后仅逗留两天，第二次到来，仅住一夜，翌晨上午十时廿

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概况及其作用

(1875—1949年)

林 金 枝

一、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的历史发展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总额约七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年约七百多万元; 在福建投资为一亿三千九百多万元, 约占国内投资总额(七亿元)的19.88%。在厦门, 根据1958年, 我们的调查统计, 从1875年到1949年的七十四年中, 投资企业共2668家, 金额达87,486,598元(人民币)。占近代华侨在福建投资的62.88%, 占在全国的12.49%。如果以城市为单位来比较, 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列第一位的, 可见, 它在福建以及全国的投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我们在厦门调查, 从1875年华侨邱忠坡在厦门经营轮船公司开始, 到解放前夕为止, 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大体经历五个阶段。五个阶段的概况列表如下:

分, 即乘原轮远逸, 临行时站在军舰甲板上, 面对浩瀚大海, 两眼一瞥鹭江绮旎风光, 随着波浪起伏, 而忧心忡忡, 感到无限惆怅, 快快离去。……

蒋介石解放前的两次来厦, 时隔三十多年, 弹指一挥间, 往事历历, 似过眼云烟, 但蒋氏早作“古人”。他昔日的处处履痕, 已成为历史陈迹!

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数量统计表(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时间	投资户数	投资金额	平均每年投资数
1875—1919	50	8,300,000	188,636
1919—1927	320	16,200,000	2,025,000
1927—1937	2019	53,346,598	6,668,324
1937—1945	10	400,000	50,000
1945—1949	269	9,250,000	2,312,500
合 计	2668	87,496,598	1,182,386

〔说明: 投资金额数字调查时, 是按原始投资币值登记(无原始货币可查者, 则直接估计为银元或人民币)。但原始投资的货币不一致, 为使读者明了实际货币起见, 我们参照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法, 把原始的币值折算成人民币。折算方法是以上海、重庆, 武汉等六大城市1937年1—6月间平均数的物价指数作为基数100, 则1955年为246。为简便起见, 把“抗战前元”一元相当人民币2.45元计算, 如系银两或外币, 则先折为“抗战前元”, 而后折为人民币。至于抗战后至解放前货币(法币, 金元券), 也依上述方法, 先折为“抗战前元”再乘2.45折为人民币。

本表数字来源, 系根据厦门市区原始的调查表格进行统计的。每年平均投资额牵涉到上下年代交差时, 我们是这样计算的: 1875——1919年以44年计算; 1927——1937年以10

年计算；1937——1945年以8年计算；1945——1949年以4年计算〕

现将各历史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发展变化作个简要回顾。投资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但是当时的投资数量很少。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银行、铁路、矿业投资，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惊醒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来提倡“收回权利”和“提倡国货”运动。华侨资产阶级也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组织资本回国投资路矿企业，如1905年陈宝琛发起组织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计划建筑嵩屿到漳州、东石至泉州、马尾至福州铁路，由于资金不足，只先建嵩屿至漳州，叫漳厦铁路。当时向南洋华侨募集资本二百多万元，投资者以印尼华侨为最多。漳厦铁路公司的创办，就是这种具有“实业救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进步意义的代表之一。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厮杀和掠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从而提供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条件，因而在这一时期，华侨投资于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者大量增加，形成华侨投资的初兴。

“五四”运动以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有明显的上升和发展，这一时期内，华侨投资数额平均每年为二百万元，比初兴时期平均每年十九万元，增加了十倍。

从1927年国民党建立反动统治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

的民族资本逐步破产和半破产的时期。可是，这一期间的华侨投资厦门企业却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有所不同，而形成华侨投资的全盛时期，无论从投资企业的户数、投资数量、投资行业和投资分布都是空前的。以这一时期的投资数量来说，平均每年投资数达六百七十万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堪称为华侨投资的黄金时代。这种情况不但厦门如此，闽粤各地如福建的泉州，晋江、漳州、福州及广东的汕头、江门、海口、梅县以及上海的情况也是这样。但必须指出，至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后，华侨投资开始趋于萎缩。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华侨投资厦门企业的大变动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投资数量迅速下降，形成投资低潮。平均每年只有五万元投资额，还不及发展期和全盛期平均投资数的四十分之一至六十分之一。第二，投资的地区转移。在抗战前，我省华侨投资主要集中在厦门市区。抗战以后，厦门沦陷，主要移至本省内如永安、永春，或祖国大西南的重庆一带。第三，在沦陷区企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掠夺；在蒋介石统治区也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大家族的迫害和摧残，所有侨办企业处于破产、失败或摇摇欲坠的悲惨情况。

抗战胜利后，祖国与海外的交通畅通，中断八年的侨汇又告活跃，加上这一时期，海外的华侨资本有所发展，因此，华侨投资厦门企业的数量较之抗战期间，呈现了回升的趋势。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以及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华侨投资很快地转趋萎缩，使近代华侨投资企业趋于总崩溃的境地。

二.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企业的几个特点

(一)特点之一是华侨投资的行业结构以房地产为主。

根据调查,华侨投资厦门的企业计有2668户,投资金额87,486,598元,按其投资的行业分,有工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其中,以投资房地产业为最多,计2,145个,投资57,025,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65.17%;其次为商业,投资11,500,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13.14%;再次为工业,投资11,050,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12.62%;金融业投资5,800,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6.62%;交通业投资只有1,600,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1.84%;服务业投资510,000元,占全市投资额的0.58%。

从上述投资的行业结构中,有几个问题,应加以说明:

第一,华侨投资以房地产业为最多问题,近代华侨在福建全省投资房地产,只占全部投资的45.53%。而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房地产竟占全市投资的65.17%。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1927——37年间,厦门市房地产业的投资数约占全市投资总数的85%,而其他各个时期的房地产业投资少。这是因为:

(1)华侨资本寻找逃避经济危机的出路。1927—32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和初期,海外华侨有的虽未直接受经济危机的波及,但已意识受到影响,必然为资本寻找出路。而当时各行各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均处于危险境地。唯有房地产业的利润是高于其他行业的。又因当时“银价发生了暴跌,……海外巨款巨量流入,其中有许多都作投资之用”。房地产投资经过几次转手,价值增了三、四倍。

结果，都市里的地产事业就顿呈活跃气象。至于1933年以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的衰退，则是由于投资房地产的利润低于银行存款利息的缘故。

(2) 银行汇价大跌，有利于汇回侨汇。根据1938年《中国年鉴》的资料，1928年，一海关两等于0.71美元；1929年等于0.64美元；1930年等于0.64美元；1931年等于0.34美元。由于汇水高，企业家乐于把款汇回祖国投资房地产业。

(3) 厦门进行市政改革。1927年以后，厦门市政当局进一步利用华侨资本进行市政改革，拆城墙，筑马路，新建市区。加上华侨有“买田起厝”的习惯，也乐于投资房地产。

(4) 内地农村，土匪到处绑票抢劫，华侨财产得不到保障，部分华侨不敢回家乡，只好在厦门另辟新居或建置房地产。

第二，商业及类似商业性投资占有一定比例问题。

商业性投资，加上类似商业性投资的金融业（侨批局和银行）以及服务业（旅馆，戏院）的全部投资，共约六百多万元，占全部投资数的20.34%。这是因为商业性投资资金周转快，容易获取利润，资本可大可小，可按华侨本身的经济能力行事，所以商业性投资带有广泛性。

第三，生产性投资不多。

生产性投资额不到一千一百万元，占全市投资额的12.62%。这点投资，主要也是投资于轻工业，如酱油、酿酒、制冰、纺织、卷烟、火柴、电池、肥皂、米绞等等，而重工业只是一家火力发电和机器修配厂而已。

从华侨投资厦门工业的分类结构情况可明显地看出，具